

## ※ 朱維錚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專輯 ※

# 朱維錚先生與章太炎研究

張鈺翰\*

章太炎無疑是二十世紀早期中國思想學術界的一位巨人，生前身後，都引起巨大關注。想要瞭解晚清民初的中國歷史，瞭解傳統學術向現代的轉型，更進一步瞭解整個中國思想學術史，章太炎都是一個無法繞過的關鍵人物。

朱維錚先生是一九四九年尤其是文革以後大陸章太炎研究的重要開拓者之一，他高度評價了章太炎的歷史地位，認為晚清民初，雖然英才輩出，「在道、學、政三者獨秀一枝或兼達二三的人物，不知凡幾，而堪稱三者均曾攀上峰頂的大家，可謂僅太炎一人」<sup>1</sup>。在整個治學生涯中，朱維錚先生都對章太炎保持著持續的興趣。雖然他並沒有撰寫有關章太炎的專門著作——他甚至沒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學術著作——但是，他整理的章太炎的文字，以及撰寫的多篇極具深度的研究文章，代表了二十世紀後半期章太炎研究的最高水準。瞭解朱維錚先生在章太炎研究方面的成績，可以深化我們對於朱先生治學特點的認識，同時也對章太炎以及晚清思想學術之研究史的梳理，具有一定的學術史意義。

本文不揣淺陋，對朱先生如何整理章太炎的基本文獻、研究章太炎的基本理路，以及在以章太炎為中心的晚清思想學術史方面的研究略做檢討，期望能夠呈現朱先生在此領域的貢獻和學術特色<sup>2</sup>。

---

\* 張鈺翰，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

<sup>1</sup> 朱維錚：〈從三個角度看章太炎〉，王維江編：《朱維錚學術講演錄》（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266。按，此文為朱維錚先生參加2004年6月在杭州舉行的「太炎精神研討會」而作的發言稿，雖收入「講演錄」，實為自撰。

<sup>2</sup> 馬勇教授〈朱維錚先生對章太炎的解讀〉（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編：《懷真集：朱維錚先生紀念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62-173）一文比較了朱先生與章太炎相似的人生經歷，從對「革命」同情理解的角度，討論了朱先生在章太炎研究方面的起因與貢獻，與本文討論

## 一、整理章太炎的基本文獻

朱維錚先生開始章太炎研究，至少從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中期就已開始。

一九七二年十月至一九七五年六月，毛澤東布置上海注釋、印製了一批大字本古代文獻，具體任務由復旦大學歷史系和中文系的教師執行。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澤東與江青談中國歷史上的儒法鬥爭，念了新作的〈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同日就布置了〈封建論〉的注釋任務。隨後至一九七四年七月為「法家著作」注釋期，共選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二十六篇，包括《商君書》、《韓非子》、《荀子》、晁錯、柳宗元、劉禹錫、王安石、李贄、王夫之、章太炎等人的著作。章太炎的〈秦獻記〉和〈秦政記〉二文，即在一九七三年八月最早布置的注釋任務之中<sup>3</sup>。

眾所周知，文革後期，在毛澤東的授意與江青等人的推動下，全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評法批儒」運動，凡是儒家，即遭批判；凡是法家，或者被毛點名為法家，即被高度讚揚。正是由於毛澤東將章太炎置於法家之列，纔掀開了重新評價、高度重視章太炎的潮流。七〇年代末開始章太炎著作的陸續出版以及《章太炎全集》的整理，都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展開的。

一九七五年六月之後，「大字本」不再注釋，但復旦大學的相關工作並未停止。當年底，以十八名工農兵學員為主成立了「章太炎注釋組」。一九七六年元旦，朱維錚先生進入注釋組，開始指導他們注釋章太炎的著作。同年，朱先生還受命為毛澤東製作大字本《廬書》<sup>4</sup>。這大概可以算作朱維錚先生從事章太炎文字整理及其思想學術研究工作之開端。

一九七六年六月出版的《章太炎詩文選注（上）》，署名為「章太炎著作編注組」，是注釋組的一項集體成果，而朱維錚先生是重要的撰稿人<sup>5</sup>。隨後，為紀念

---

的側重點有所不同。

<sup>3</sup> 劉修明：〈前言〉，《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頁8-11。

<sup>4</sup> 楊子採訪：〈學者朱維錚指導工農兵注釋章太炎〉，《南方人物週刊》，2006年第3期，頁31-33。

<sup>5</sup> 1980年7月29日致汪榮祖函中云：「所詢《章太炎詩文選注》上冊，文選部分確係全出弟手。惟付梓前經人亂改，塞入所謂儒法鬥爭詞句不少，故弟已不願道及。下冊本已排版，因弟欲改上冊後一併印行，因而中輟。然選文全被《政論集》竊取，今編選集，只能全部重摘，仍為注釋本。」朱先生致汪榮祖先生各函均由汪先生提供，謹致謝忱。

辛亥革命七十週年，朱先生應出版社之約，與人合作編注了《章太炎選集（注釋本）》，於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該書共選章太炎一生較有代表性的論文、講稿、序跋、函電和其他雜著共六十九篇，又附錄八篇，並予以校勘、標點、分段和注釋<sup>6</sup>。該書選目頗具特色，側重於章太炎論學論政的文字，尤其是對於人類歷史社會演進、排滿革命等方面的理論思考，還首次發表了章太炎的一部分未刊稿，凸顯了章太炎「有學問的革命家」或者說「革命思想家」的形象；該書尤以注釋之精當為人所稱道，使得章太炎的文字能夠被人理解，所以很快便風行一時，得到海內外學界的高度評價。

章太炎文辭之古奧世所共知，又好用古字，即使在當今之學界，也並非人人都能夠順利閱讀，更談不上理解，即魯迅說木刻本《煇書》的「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sup>7</sup>。朱維錚先生從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初開始隨周予同先生編注《中國歷史文選》<sup>8</sup>，後來在文革中又通讀二十四史，通讀兩遍正續《清經解》<sup>9</sup>，在傳統經史之學方面打下了相當牢固的基礎，所以對章太炎的古言古語並不覺得陌生和困難。但是，「古典」尚屬於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更困難的是所謂「外典」，即章太炎提到的東西方人物、書籍、學說，以及「近典」抑或「今典」<sup>10</sup>，即涉及章太炎所處時代的歷

<sup>6</sup> 本書因為朱維錚先生與人合作，其中具體哪些部分出自朱先生之手，殊難斷定。惟其中的二十四則篇目說明，已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走出中世紀》及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的《走出中世紀（增訂本）》之中，且並未引起另一位合作者的異議，可以說為先生手筆。對比上文引及致汪榮祖函中以為人篡改而不願道及的《章太炎詩文選注》，本書則為共同署名，且朱先生在日後多有引及其中的「拙見」，表明書中的看法、注釋，都是經過他認可的，可以用作討論朱先生有關章太炎看法的材料，是不成問題的。又，該書的部分標點、選目出自朱先生之手的直接證據，可參姜鵬：〈《姜義華口述歷史》質正（下）：《章太炎選集》的校注與署名〉，《澎湃新聞》，2015年12月17日，網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950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9505)。

<sup>7</sup>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6卷，頁547。

<sup>8</sup> 關於朱維錚先生跟隨周予同先生編注《中國歷史文選》以及後來修訂此書過程中的部分具體工作，可參鄒振環：〈經典創造與學術傳統：周予同主編的《中國歷史文選》〉，《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頁88-97。又當指出的是，朱維錚先生晚年有意對此書再加修訂，並已經完成了部分篇章的注釋和解題。

<sup>9</sup> 朱維錚：〈談學——朱維錚答李天綱〉，中西哲學與文化交流中心主編：《時代與思潮》（上海：學林出版社，1989年）；後收入朱維錚：《音調未定的傳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338。

<sup>10</sup> 陳寅恪先生在〈讀袁江南賦〉中首次提出「古典」與「今典」的概念：「解釋詞句，徵引故實，

史，也包括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章太炎選集（注釋本）》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是該書之所以特出的重要原因。

對所謂「近典」或「今典」的注釋，一般來說，章太炎文中直接涉及的晚清人物、事件，對研治晚清史的專家來說並不那麼困難，但受限於當年大家所掌握的材料，許多問題也並不都是大家所瞭解的。比如致夏曾佑二函，前者中的「步君原韻二章」，注釋將嚴復的〈和夏穗卿兩首〉全文引出，使讀者可以明白，為什麼章太炎會有「有劉越石氣體」的評語<sup>11</sup>；後者中提到「海上黨錮，欲建國會」，當時孫寶瑄《忘山廬日記》尚未出版，大家對於「中國議會」的相關情況瞭解有限，注釋則發掘出了孫氏日記稿本，予以較為詳細的說明<sup>12</sup>。還有章太炎文章中的一些「隱語」或暗中針對的對象，也不是一目瞭然的，需要對晚清的思想學說比較熟悉纔可以明白。如〈致陶、柳二子書〉中「尚不能迷於對山之妄語」，「對山」所指何人？注釋不但解釋說，明代康海號對山，而康有為人稱康南海，所以此處對山指康有為；更指出康海走大太監劉瑾的門路，成為劉瑾的黨羽，而章太炎認為康有為的生平與康海一樣無特操，所以用對山稱呼康有為，含有蔑視的意味<sup>13</sup>。再如〈茵說〉一文<sup>14</sup>，不但在篇前說明中指出，此文乃是針對譚嗣同《仁學》而發的批評，更細緻地指出，文中「性海即以太」，指譚嗣同將孔子的仁、佛教的性海、基督教的靈魂都附會成以太；「原質之成於以太」是指譚嗣同主張「原質之原，則一以太而已」<sup>15</sup>；「或者以為民氣選儒，不能與釋迦、基督布教之國抗者，由是故也」<sup>16</sup>，在指譚嗣同認為中國所以弱，是因為荀況、秦始皇敗壞了孔學，使得中國人「徒泥於體魄，而不知有靈魂」<sup>17</sup>。凡此種種，非對晚清思想學說有相當之熟悉不能為也。這樣的注釋，不僅解釋「本事」，且更深一層，直探章太炎的「本意」。

再讓我們對比徐復先生的《馮書詳注》（簡稱《詳注》），以見《章太炎選集

---

必有時代限斷。然時代劃分，於古典甚易，於『今典』則難。蓋所謂『今典』者，即作者當日之時事也。」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09。

<sup>11</sup> 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章太炎選集（注釋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11。

<sup>12</sup> 同前註，頁116。

<sup>13</sup> 同前註，頁150。

<sup>14</sup> 同前註，頁51-87。

<sup>15</sup> 同前註，頁71。

<sup>16</sup> 同前註，頁79。

<sup>17</sup> 同前註，頁80。

(注釋本)》(簡稱《選集》)在「外典」注釋方面的特色。《詳注》注釋的是《煊書》重訂本，其第一篇〈原學〉，《選集》也有注釋，二者可資比對<sup>18</sup>。首段中，二者出注相差不大，都注釋了「鬱蒼蒼」、「地齊」、「材性」，《選集》的注釋較為簡明，如云「地齊，地理；材性，才能、個性；發舒，發展」，在使人簡單易懂。《詳注》則遍引《禮記·王制》及鄭注、孫希旦《集解》、《新書》、《禮記·中庸》及鄭注，以表明每一字的古典來歷。對於「鬱蒼蒼」，二者對字面含義進行了解釋，《詳注》引《爾雅·釋言》及李巡注，重在說明「鬱」表示「大氣」，而《選集》不僅說是「地球大氣層」，更進一步指出「章太炎以為沒有所謂『天』，人們說的『天』，無非是視覺造成的幻影」<sup>19</sup>。《選集》以章太炎自己的意見進行解說，由此而使得下半句「立學術者無所因」一語有了著落，更利於我們理解章太炎的原文。而差別在第二段更為明顯。「希臘言：海中有都城曰韋蓋，海大神泡斯頓，常馳白馬水上而為波濤」<sup>20</sup>。對此句，《詳注》僅注「泡斯頓今譯波塞冬」，《選集》則分別指出：希臘言指希臘神話，海指愛琴海，韋蓋為神話中海王的都城，海大神即海王，為波濤指海王駕駛戰車在海上巡行時就會掀起暴風巨浪，對於章太炎文中涉及的西方「故實」解釋得更為詳細。下文對於「韋斯拏」、「摩拏」、「魚富蘭那」的注釋，《選集》也在說明其所指為何之後，進一步解釋它們與章太炎文中提及的「鴻水」的關聯，這也是《詳注》所不具備的。再下文提及柏拉圖、培根(即培根)、路索(盧梭)，《詳注》對其生平及主要學說進行簡要的注釋；《選集》則不泛言他們學說的核心要義為何，而是結合章太炎的原文，重點疏釋柏拉圖的「三階」為何，「懲貴族主義」何意，培根如何「光大冥而倡利己」，盧梭怎麼「極自由」。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看出，《詳注》對於章太炎文字的古典出處釋之極其詳盡，展示了注者的古典素養，也可以使我們領略章太炎深於傳統經史之學；《選集》則在「外典」方面更勝一籌，且更易於讀者瞭解章太炎文中所指的具體意涵。

在編注《選集》的同時，朱維錚先生也參與籌劃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工作。根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章太炎全集》編輯、標校初步分

<sup>18</sup> 章太炎撰，徐復注：《煊書詳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37-41；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章太炎選集(注釋本)》，頁188-193。

<sup>19</sup> 按，章太炎早年主張「視天」說，即看起來青色的天，是空氣和質子、乙太合力形成的；而在〈視天論〉中，章太炎已否定此說，參《章太炎選集·視天論》及說明(頁38-50)。

<sup>20</sup> 章太炎撰，徐復注：《煊書詳注》，頁37。



工」，由朱先生負責整理《煇書》（木刻本）以及與人合編《太炎文錄二編》（辛亥革命前報刊佚文輯錄）。當時參與整理《章太炎全集》的學者，絕大部分是章太炎的弟子，或其弟子帶領的學生，唯有湯志鈞、姜義華和朱維錚先生以其在文革後期從事相關工作而得以列名其中，另外還有章念馳先生作為家屬，也參與其中。在當時，這幾位無疑屬於「小字輩」。他們能夠參與整理《章太炎全集》，應該說在學術水平上是得到了王仲榮等章門弟子，以及具體承接出版工作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認可的。

一九八二年開始，《章太炎全集》陸續出版，具體的分冊以及整理者都有所調整，其中的第三卷由朱維錚先生整理，於一九八四年七月正式出版。該卷不僅收錄了原計劃的木刻本《煇書》，還包括它的第二次結集本和第三次結集本《檢論》。對前兩種，朱維錚先生分別名之曰「《煇書》初刻本」和「《煇書》重訂本」，這成為後來學界通行使用的名稱。而將同一作品的三次結集本同時收錄於一冊之中，可資比對，在古近文獻的整理中似屬首創，直接呈現了章太炎的思想變遷之跡，成為後來研究普遍接受的一種「敘述框架」。

在八〇年代出版的《章太炎全集》各卷之中，第三卷應該是整理比較好的一種，但其中也並非完全沒有錯誤。金文明在仔細校讀之後，曾致信朱維錚先生指出其中的訛誤，朱先生在覆信中不僅大方承認，還鼓勵金為文發表。此信頗有助於我們瞭解朱維錚先生整理《章太炎全集》第三卷的過程和態度，特引述如下：

文明兄：

六日手教拜讀。上月底您駕臨寒舍，未能躬迎，歉甚。您的關注已由陳維轉達，至感。

……

拙校《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出版至今，尚未得到專家指正。實則中間確有校點錯誤。當時手頭事情甚多，工作時斷時續，兼以藏書不足，有時想檢查，被它事打斷，久之又忘了，故於故典常憑記憶，於近典又時逞胸臆，大悖考據準則，出錯只可說咎由自取。印出後偶而翻閱，已發現好幾處，每見輒為汗顏。少數誤字及標點疏漏，在校樣上已改，印出誤漏如故，也無可如何。由於全集一、二、四、五卷校點錯誤頗多，尤以一、二卷為甚，均有專家作文予以批評，而三卷獨無，故六月在杭州章太炎討論會上，謬承與會學者誇獎，當時即倍感惶惑，逢此即聲明三卷仍有錯誤，希望批評。

因而今得吾兄詳予批評，讀後欣喜異常。所指二十三則紕繆，均屬事實。〈儒兵〉「偶差智，故而駭」，句讀確誤，當依尊示據《淮南子》改正。〈正名略例〉「蒲姑東土，奄君之號」，在點《檢論》時查了書，但未及將《煇書》中改正，暴露確有據胸臆亂點的問題。〈明群〉、〈原教〉引號錯誤，即為憑記憶引書所致。〈獨聖〉、〈易論〉兩條錯誤，也是未細核查所致。凡此得尊示指示，惶愧之餘，無任感激。它如校誤、刻錯之處，前此已有發現，但尊示指出處較我已發現者尚多四處，足見我複讀自己校點本亦頗粗心，得您如此細心一一予以指出，令我極為感動。

我自己發現的尚有數處，有的是當時沒把握，應斷未斷，但也有明顯不當處。倉促不及翻出標識處，僅錄一條呈正。〈獨聖上〉(P.102, 5、6行)：「非申無明萬物之自鼓舞者，然也。」「無明」下應加逗號，「者」下逗號應取消，否則不符原意。

總之，對您的指正，除感激外，只能引咎自責。此書出版，雖較它卷謬誤為少，但於讀者來說，有一謬誤，倘不加辨正而引用，即致「謬種流傳」。故而在我於心至為不安。鑒於此書再版不知何日，因此建議您將尊示「隨記」著文發表，以將高見公諸讀者，說明我改正錯誤，未知俯允否？至盼有暇對拙稿予以指正，再次申謝。(倘尊示未留稿，祈示知，當璧還改作。)

專此奉覆，順頌

文安！

弟朱維錚謹上

九月十夜<sup>21</sup>

<sup>21</sup> 引自金文明：〈學者風範——朱維錚教授的一封信〉，原刊《澎湃新聞》，2012年3月18日；後收入《懷真集》，頁135-136。按，是信未署年分，按金文明文中之意，似為1984年。然《章太炎全集》第五卷出版已在1985年2月，第四卷更在1985年9月，信中言及此二卷，必當在此二書出版之後。又，信中提及「六月在杭州章太炎討論會」，當為1986年6月14日至18日在杭州舉行的「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會暨學術討論會」，故此信當作於1986年。又，信中所謂「尤以一、二卷為甚，均有專家作文予以批評」，有張文質：〈努力做好《章太炎全集》的校點工作——讀《章太炎全集》第二卷瑣議〉(上、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頁83-92；第2期，頁72-86。周大璞：〈《章太炎全集》第一冊標點商兌〉，《古籍整理與研究》第1期創刊號(1986年10月)，頁203-215(按，是刊雖為10月正式出版，而朱先生有可能在發表前已先看過此文)。

對於《煇書》的初刻本和重訂本，後來朱維錚先生又將之收入由錢鍾書先生主編、他自己擔任執行主編的「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之中，並編製了人名索引、域外人名索引和書名索引。

章太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國故論衡》，朱維錚先生本也擬採取與《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同樣的整理方式，將該書的初版本與修改本各存原貌匯於一編，並已經整理完成，卻未能正式出版。而擬收入「新世紀萬有文庫·近世文化書系」的初版本簡體整理本，不知為何也未面世，不免令人感到遺憾。

二十世紀七〇、八〇年代是章太炎相關著作系統整理的重要時期，主要出版了《章太炎全集》（一至六卷）<sup>22</sup>、《章太炎選集（注釋本）》、《章太炎政論選集》和《章太炎年譜長編》，這些著作為後來的章太炎研究提供了基本的閱讀文本。由以上介紹可見，朱維錚先生無疑屬於其中的重要開拓者之一。

## 二、研究章太炎的兩個基本路徑

朱維錚先生從事章太炎相關研究的時候，大陸的章太炎研究尚屬於起步階段。受制於所謂「唯物史觀」下階級分析的理論框架，以及「評法批儒」的影響，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初的章太炎研究，在基本文獻的整理、發掘之外，主要集矢於章太炎的階級性質，即他的思想是代表在當時屬於進步的資產階級，還是落後的封建地主階級？他是提倡改良，還是主張革命，還是又有了保守倒退——尤其在與孫中山的分歧方面<sup>23</sup>？對此，朱維錚先生是有所不滿的，而走了一條在當時、乃至在今天，都有些與眾不同的研究道路。

「國內史學界關於章太炎思想之估計，分歧頗大。主要集中於辛亥前十年他思想的性質。此公文章古奧，索解頗難，致論著每多誤解，弟做的是笨功夫，由注釋

<sup>22</sup> 前六卷出版之後，因種種原因，《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出版陷入停滯，已經整理完成的第七卷和第八卷，分別出版於1994年和1999年。2012年，《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重新啟動，至201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齊。

<sup>23</sup> 1980年8月29日致汪榮祖函：「關於章氏思想之爭論焦點，據愚見大約有三，一為章太炎是否僅主『排滿』而不反封建；二為其與孫中山分歧屬何性質；三為其是否贊成民主共和。討論的時期，集中在辛亥革命前後。」



入手，尤注意他思想的現實來源，故見解每與人有異」<sup>24</sup>。在致汪榮祖的信中，朱維錚先生夫子自道，點出了自己研究章太炎的兩個基本路徑。

其一是做「笨功夫」，「由注釋入手」，這就是上文提到的《章太炎選集（注釋本）》。注釋要求對文字中涉及的難解字詞、中外典故都予以解釋，說明其來源，講清楚涵義。如果有關鍵字詞遺漏不注，則等於注釋者自曝其短，表明其並未能理解，所以必須要通過大量的努力工作，對所有的疑難之處都進行恰當而準確的解說。與這一過程類似的還有翻譯，包括古文譯成白話文，或一種文字譯成其他文字——或許更為嚴格。因為母語閱讀本身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意義遮蔽，大體明白其涵義即不影響閱讀，但常常會對稍微難解的關鍵字詞模糊帶過，從而影響到對文本的準確理解。但注釋、翻譯，則必須直面文本的挑戰，不容含混不清，不容模稜兩可，雖然要花費大量精力，卻為真正理解文本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朱維錚先生經過注釋這一「笨功夫」，等於是對章太炎的文章進行了反覆的深度研讀，在準確理解章太炎文章的內涵方面自然占有優勢。

這種「笨功夫」還體現在朱維錚先生對某些具體的「時」、「地」、「人」、「事」的精細考訂與不斷追索上。比如對於《嘯書》初刻本的結集完成時間，所謂「辛丑後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朱維錚先生首先指出，所謂「後」，當從壬寅年（1662）算起，而不應從南明永曆十五年（1661）開始數，於是章太炎首次完成《嘯書》的時間就可以斷在己亥年十二月即一九〇〇年一月底以前。同時，對於章太炎在《嘯書》以及其他地方提到的時間斷限，如「自永曆喪亡，以至庚子，二百三十有九年」，「永曆既喪」，「貫二百三十九年而諸夏無主」，朱維錚先生指出這是章太炎明白在說「主」喪之後的「無主」時間；又章太炎在壬寅年（1902）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朱先生根據章太炎起草的宣言書，說明這乃是指「明祚既移」的週年數。種種看似矛盾的陳述，得到了合乎歷史與邏輯的解釋，可為定論。

<sup>24</sup> 1980年7月6日致汪榮祖函。又對於當時日本的章太炎研究，朱維錚先生也有所批評，1980年7月29日致汪榮祖函云：「關於章太炎的思想，國內史學界爭論頗多。去年出版之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一書內論章太炎一文，尚可閱。兄所舉日人著作，弟均曾流覽。日本學者搜羅史料頗勤，然而大抵就思想論思想，往往察秋毫而遺丘山，弟頗不欣賞此種研究方法。」朱先生的這一判斷可謂一語中的，至今天仍然大體適用。當然，筆者並不反對專治「思想」本身，這樣一種類似「哲學」的研究進路仍有其價值在，尤其是對於章太炎這樣思想比較深刻的學者而言。

又如《選集》收入〈再致夏曾佑〉一文，函中用隱語有云：「信國欲藉力東、西，鑄萬欲翁、陳坐鎮，梁公欲密召崑崙，文言欲藉資鄂帥。」<sup>25</sup>《選集》以為，文天祥封信國公，故「信國」指文廷式；「鑄萬」為唐甄之字，這裏指唐才常；「梁公」以唐狄仁傑封梁國公，故此指狄葆賢；「崑崙」因明李介號崑崙山樵，故指李鴻章；「文言」為「十翼」之一，因乾坤德大而作〈文言〉，葉瀚字浩吾，浩瀚形容天地廣大，故此疑指葉瀚<sup>26</sup>。這裏面需要注釋者對「古典」與「今典」都熟悉纔能準確釋讀。十多年後朱維錚先生對其中所指兩個人物有所修正，一是「崑崙」當指康有為，以譚嗣同有「去留肝膽兩崑崙」語；二是晚明東林黨有汪文言，故「文言」當指汪康年<sup>27</sup>。以材料所限，或一時未能查核準確，注釋有誤在所難免，朱維錚先生也並不諱言自己曾經的失誤。這裏想要指出的是，朱維錚先生持續地對於細節的重視，甚至具有某種「考據癖」。

這些考訂，看似繁瑣，是「笨功夫」，也是「死功夫」。一方面，這是清代樸學「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傳統，另一方面，朱維錚先生願意花大力氣在這些「笨功夫」上面，是因為他認為，只有這樣，纔能真正搞清楚事物的本來面目。也只有這樣，纔能弄明白歷史究竟「是什麼」！這是他認為從事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和起點。事實搞不清楚，時、地、人、事有誤，那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究，豈非根基不牢？豈能逃脫「沙灘上蓋樓」，隨時有倒塌的危險？「沒有歷史細節的真實，就不會有歷史的真實；而沒有歷史的真實，歷史就可以隨意被詮釋，被利用」<sup>28</sup>。歷史的實相，正是由這一個又一個細節的真實構成的。朱維錚先生的「笨功夫」，即是要從細節處追求歷史的實相，這也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相當大的便利和進一步研究的基點。

弄清楚了「是什麼」，然後纔能追問「為什麼」。朱維錚先生並不太關心章太炎的思想到底屬於什麼性質，反而特別「注意他（章太炎）思想的現實來源」，即

<sup>25</sup> 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章太炎選集（注釋本）》，頁 115。

<sup>26</sup> 同前註，頁 117。

<sup>27</sup> 朱維錚：《〈煊書〉發微》（作於 1992 年 4 月），《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279 註 12。附帶說明，朱維錚先生的學術文章，正文簡明扼要，注釋則不厭繁瑣，很多細節的考證乃至某些展開批駁的觀點都體現於注釋之中，當提請讀者注意。

<sup>28</sup> 趙嗣胤、胡思思：〈朱維錚：本職規定了我一定要從事基础性工作〉，尹冬梅、王宏舟主編：《報導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343。

力圖「探討近代中國不同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存在，如何在章太炎的頭腦中變了位並且變了形，融化成他在政治上和學術上的特殊認識，以便進而考察他思想變化過程的全貌」<sup>29</sup>。也就是說，朱先生研究的重點，在章太炎的思想變化，以及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這樣一種結合歷史現實討論章太炎思想的取徑，在當年，與一般就思想談思想的研究，或將章太炎視作一個被批判的靶子，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民報〉時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是朱維錚先生最早單獨發表的一篇有關章太炎的論文<sup>30</sup>。在此文中，他剖析了章太炎在主筆《民報》期間革命觀的主線、國家論的矛盾，特別注意章太炎對於盧梭的「天賦人權論」、「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等西學的吸收、借鑒以及批判。文章限定在「《民報》時期」，是因為在朱先生看來，章太炎的思想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不能用早年的思想涵蓋後來的變化，也不能用晚年的「定論」來否定章太炎的前半生。比如，指出章太炎的「排滿」思想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以為《自定年譜》所謂年十三「甚不平」，「念《春秋》賤夷狄之旨」總令人疑多於信，缺乏證據；辛亥以後提到「逐滿」，更多在追述歷史，而再也不提將清朝皇室趕回黃龍府等具體的方案。在《民報》時期提到排滿，文章不多，也不如之前激烈，原因即在於章太炎對現實形勢的判斷，認為當時「實行」重於「言論」，「反滿」情緒既已激起，則重心自當轉移。「這種變化，正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具體表現，應該作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sup>31</sup>。

《嘯書》是章太炎在晚清排滿革命中「振聾發聵」的著作，也使他獲得了「革命理論家」的地位。之前章太炎雖然為鄒容《革命軍》作序，作〈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公然提倡排滿革命，激起愛國青年讀書人的革命熱情，並引起了清廷的震怒和恐慌，但那更多是酣暢淋漓的「宣言」，尚不足以對保皇黨的理論構成真正的衝擊，而《嘯書》重訂本纔是真正在理論上宣揚排滿革命、光復中華的完整著作。對於《嘯書》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重點，而朱維錚先生有導夫先路的作用。在編注《章太炎選集（注釋本）》時，朱維錚先生就在〈客帝匡謬〉、〈原學〉等文的說明中，展現了他對於《嘯書》的深刻認識。隨後在前後兩次整理《嘯書》的過程

<sup>29</sup> 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編注例言〉，《章太炎選集（注釋本）》，頁2；朱維錚：〈關於早年章太炎〉附識，《走出中世紀》，頁289。

<sup>30</sup> 該文原刊《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5期；後改題〈《民報》主編章太炎〉，收入《音調未定的傳統（增訂本）》（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66-383。

<sup>31</sup> 同前註，頁383。

中，朱維錚先生為之撰寫了兩篇充滿睿見的導言，即〈《煇書》《檢論》三種結集過程考實〉和〈《煇書》發微〉<sup>32</sup>。

「煇，迫也」。《煇書》之作，章太炎自謂「述鞠迫言」，也就是「裏面輯集著窮蹙的環境迫使他非說不可的話」，「所謂窮蹙，當然主要指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尤其指關係著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政治環境」<sup>33</sup>。從撰寫《煇書》初刻本到《煇書》重訂本完成的那幾年，章太炎所處的社會現實變了，他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那麼，「作者仍感不滿，不是又會有話想說，並刪改乃至否定舊說嗎」？在研究中，朱先生特別注意《煇書》的整個理論體系，以及外在客觀環境的變化，如何催生了《煇書》由初刻本向重訂本的轉變。他指出，《煇書》初刻本首篇為導言，末篇為總結，以「尊荀」始，以「尊荀」終，這是對戊戌維新期間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等人提倡「排荀」的一種回應。但隨著庚子禍亂和唐才常自立軍失敗的刺激，章太炎表示自我懺悔，《煇書》重訂本首列〈客帝匡謬〉和〈分鎮匡謬〉，就是表示與「尊清者」分道揚鑣。它在結構上雖然沒有大變，以首篇〈原學〉為導言，以末篇〈解辮髮〉為總結，但思想內容卻是一反前說，從在「中國國會」上當眾「割辮」起，由尊清而反清，由宣傳改良而提倡革命，由「康有為改良主義的異端理論變為以『光復舊物』相號召的資產階級革命理論」，由此，《煇書》的重訂本，「首次為當時還是幼小的革命民主派，提供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sup>34</sup>。而隨著「感事既多」，至少從一九〇〇年開始，章太炎再修治《煇書》重訂本，至一九一五年而成《檢論》，裏面也蘊含著對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總結，對袁世凱黑暗統治的抨擊。確實，《檢論》在學術體系和表述上更加成熟，但不能不承認其中反映了章太炎對變化的社會現實的思考<sup>35</sup>。總之，無論是《煇書》初刻本，還是重訂本，乃至《檢論》，都可以說是以學術形式發表的「政論」。

<sup>32</sup> 前者最初發表於《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1期，後作為《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三卷的前言，二者基本觀點並無不同，但在文字上頗有差異；後者最初發表於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卷1，後作為朱先生執行主編的「中國近現代學術名著叢書」之一《煇書初刻本、重訂本》的導言，再收入《求索真文明》。

<sup>33</sup> 朱維錚：〈前言〉，《章太炎全集》，第3卷，頁1。

<sup>34</sup> 〈關於早年章太炎〉中對於〈原學〉的說明（《走出中世紀》，頁271-273）；同前註，頁11。

<sup>35</sup> 同前註，頁18-22。

作為同保皇黨、改良派鬥爭的革命理論，除了正面闡述章太炎對於「學」、「人」、「變」、「教」進化之跡的考察，朱維錚先生以為，在《廬書》重訂本中，章太炎「論學的箭垛始終在『訂康』」，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訂孔〉：康有為的保皇主張不是抓住了「紀孔」的旗幟嗎？那章太炎的邏輯就是把康有為的論點推向反面——孔子只是做了老子、墨子不願做的刪定整理古代典籍的工作，他智慧德行不及孟子，博學通識不及荀子，其名遠過於其實，唯一配得上的就是「古良史」，後來能夠與孔子名實相匹的，則是劉歆——剛好否定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說。「對《廬書》研究來說，〈訂孔〉的意義在於凸顯了章炳麟的一個強烈意向，即認定從根本上駁斥康有為學說，是召喚革命的迫切要求」<sup>36</sup>。其他各篇之中，針對康有為及今文學說，也所在多有，像〈清儒〉、〈學隱〉「當初的寫作意向，主要是為了駁斥康有為的先輩魏源所謂乾嘉漢學『錮天下知慧為無用』的說法」<sup>37</sup>。〈尊史〉證明中國早有文明史的專著，也足以證明中國文化的進退，「順便給了康有為一掌，暗示公羊三世說乃偽進化論」<sup>38</sup>。

不止在《廬書》之中，朱維錚先生以為，章太炎的很多文章，都有「靶子」在。比如〈儒術真論〉通過辨析荀子之學和墨家、法家的異同，以批評康有為、譚嗣同建立孔教論的錯誤；〈菌說〉講進化論，是在哲學上批判譚嗣同的《仁學》；〈徵信論〉重新強調漢學「實事求是，無微不信」的傳統，意在揭示康有為等「或陷於臆測」、「或一味誅心」、「或疑而不決」、「或亂發空論」的危害；〈論諸子學〉中講述孔子襲老子之術而反將其逼走，也有暗諷康有為對待廖平及戊戌後康氏對於梁啟超自立門戶無可奈何的命意在；〈與人書〉表面在批評藍公武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但背後針對的其實是張東蓀，以及王國維<sup>39</sup>。如此種種，雖然未必盡如朱維錚先生所論，上述各文都有批判「時學」的「微言大義」在，但不能否認的是，章太炎確實往往在文章中暗藏機鋒。通過這些具體的研究，朱維錚先生實際上指出了研究章太炎非常重要的一點，即「按照章太炎早年作文的習慣，他每作一文，尤其是駁論式的作品，儘管常常不肯指名道姓，卻一般都有具體的辯

<sup>36</sup> 朱維錚：〈《廬書》發微〉，《求索真文明》，頁 273-274。

<sup>37</sup> 同前註，頁 274。

<sup>38</sup> 同前註，頁 277。

<sup>39</sup> 以上皆見〈關於早年章太炎〉中相關篇目的說明。



論對象」<sup>40</sup>，這也屬於朱先生所常提及的「今典」或「近典」的範疇。那麼，研究章太炎，就不僅要讀懂文字本身，更要廣泛瞭解與他同時代的各種思想學說、人物事件，「力透紙背」，不然，很容易流於表面，「單看現象，單看觀念，說不清楚思想的變化」<sup>41</sup>。這樣的研究方法，與余英時先生疏釋陳寅恪先生晚年詩文的思路頗有異曲同工。只不過，詩文本即為「言情」、「言志」之作，雖往往出之以隱語，卻給人以探賾索隱的空間。而章太炎的文字，多以論學的方式呈現，所以其背後的「微言大義」，常為人所忽略。

順便說一句，像章太炎那樣「言在此而意在彼」，或者說「順手一巴掌」，在朱維錚先生也是拿手好戲。比如他在注釋中表示，從《馗書》到《檢論》所反映的章太炎的思想變化值得研究，但卻蕩開一筆，指出「討論的前提，似應將二書讀懂」<sup>42</sup>，這不是在批評有些人根本沒有讀懂章太炎這部大書麼？朱維錚先生自述在《章太炎選集》中特意選注〈革命道德說〉一文，「正值辛亥革命七十年祭，也有感於改革者提倡思想解放，許多言論竟與辛亥革命前夜的改革爭議相似。因而明知誰都不會真的『以史為鑒』，仍然以為此篇也許可以讓識者從先輩遺教中悟出一點淺顯道理」<sup>43</sup>。又比如，他批評康有為害怕人民真正覺醒，「又要民眾支持，又要愚弄民眾，歸根結底只需要民眾盲目追隨他們這班『造時勢之英雄』，「既然對人民不可講真話，既然要使人民永遠做『聖人』的應聲蟲，那末對人民實行欺騙，耍兩面派，也就是康有為所謂聖人『施於治也，意在彼而跡在此』」<sup>44</sup>，未必沒有針對最近幾十年他所經歷的現代史的「言外之意」在。又如〈走出中世紀——從晚明到晚清的歷史斷想（續）〉的開篇第一條，引用俄國人類學家史祿國的意見，討論何為滿洲，其意實在於批評主管部門要求不許稱「滿洲」、只能改為「滿族」的顛預而無知。這樣一些「言外之意」，自然需要對朱維錚先生所面對、處於其中的「世界」有所瞭解，纔能「有會於心」。

對於考察章太炎思想的現實來源，〈章太炎與王陽明〉一文，以及相關的〈陽

<sup>40</sup> 朱維錚：〈章太炎與王陽明〉，原刊於《中國哲學》第5輯（1981年5月）；後收入朱維錚：《求索真文明》，頁307-308。

<sup>41</sup> 朱維錚：〈關於早年章太炎〉，《走出中世紀》，頁280。

<sup>42</sup> 朱維錚：〈章太炎與王陽明〉，頁330註70。

<sup>43</sup> 朱維錚：〈又說「國學大師」〉，《音調未定的傳統（增訂本）》，頁189。

<sup>44</sup> 朱維錚：〈章太炎與王陽明〉，頁313-314。

明學在近代中國〉，也鮮明地反映了朱維錚先生這一研究取向的特色。章太炎對於王陽明其人其學的議論，在朱先生之前並沒有什麼人注意，是朱維錚先生首先揭示出章太炎的「議王」，不僅表現了一位思想家對陽明學的見解，也反映了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場重要論爭。朱先生考察了章太炎從〈王學〉到〈譴王氏〉再到〈議王〉中對於王陽明批判角度的變化，語氣的不同，以及標題所反映的態度的變化，以為他的見解變來變去，自相矛盾，分明逐漸傾向王陽明卻又時時予以批評，那原因，只能從他的論敵的言行中去找，只能從他的政治實踐與取向中去找，纔能得到比較合乎歷史與邏輯的解釋。

朱維錚先生指出，《煊書》重訂本中的〈王學〉批評王陽明沒有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只是一個有才氣的權術家，一個靠剽竊和權勢成名的假學者（這與〈訂孔〉對孔子的評價頗為一致），並不符合歷史上王陽明的實相，卻相當符合現實中康有為之學的特色。發表於《民報》上的〈譴王氏〉本在與梁啟超論戰，其對王陽明的批評，重點已轉移到否定他的功業，雖名為「譴」，意在「發落、放逐」，語氣卻多存規勸，不止對梁啟超，也針對許多革命黨人對於王陽明的興趣。《檢論》中的〈議王〉繼續否定王陽明的心術、功業，更激烈反對陽明學是日本富強動力的說法，卻對王陽明的人品表示讚賞，正是要議論推翻滿清後革命黨毫無政績，並沒有使國家富強，卻又因受到袁世凱的大肆誹謗而有被辯護的必要。可見，章太炎的三篇文章，都有特殊的撰寫背景，他對王陽明其人其學的態度，首先服從於論戰的需要。朱維錚先生的解釋，通過對思想之所以形成的「歷史現實」的揭露，使得章太炎思想中看起來的矛盾諛然理解。

對比此後不久孫萬國的商榷文章<sup>45</sup>，不難看出朱維錚先生的命意所在。孫氏將章太炎首先視作學者，其次纔是政治活動家，所以他注重從學術本身的脈絡來探求章太炎思想的變化。儘管有其價值所在，但並不足以駁倒朱先生。直到近年，仍有不少學者關心章太炎如何評價王陽明，但基本的思路，仍然不出朱先生的範圍，或是在被朱先生所批評的範圍之內。

由此，朱先生指出了研究近代有重大影響的一流人物思想的一條「通則」：

要考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孫中山等的思想或哲學，你就不能不考察他們的政治生涯對他們思想變化軌跡的作用。在這方面，我相信馬

<sup>45</sup> 見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98-368。

克思、恩格斯的說法，就是研究思想、文化、宗教等的歷史，必須注意「政治進程對於歷史進程的真正的歷史的干預」。<sup>46</sup>

不難看出，朱維錚先生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忠實信徒。在他看來，思想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必然是個人所處的種種社會經濟關係的結果。要研究章太炎這些人思想的實相，要把他們放到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中去。抽離出他們所處的環境，得到的只能是研究者出於個人主觀虛構出來的幻影。朱維錚先生並沒有一直套用馬克思的理論，但卻在研究中時時注意從真正的歷史出發，而不是從一種觀念出發，反而無論是在方法上還是精神上，貫徹了真正的馬克思理論。這樣的理論自覺，已然融入到朱先生的整個學術研究乃至觀省社會現實之中，所以，他給普通讀者推薦的書，竟然也是《資本論》，或者請讀者至少讀一下它的第一卷初版序和再版跋，以及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sup>47</sup>。

按照朱先生的意見，章太炎每根據時勢的變化調整自己的論點，則他頗似信口雌黃的「政客」，如何當得起「學術大師」之稱？對此，朱先生給予了「歷史」的同情。「章太炎是大學者，但不是純學者」，「他關注的首先是民主革命的命運，他從事的首要的是用筆和舌去同不利於這個命運的思想或宣傳抗爭」<sup>48</sup>。但即使他的出發點是好意，卻也流弊無窮。雖非阿世，而不免於曲學。對此，朱維錚先生也有所警惕，雖表同情，卻並不贊成：

<sup>46</sup> 朱維錚：〈陽明學在近代中國〉，《走出中世紀》，頁 251。

<sup>47</sup> 朱維錚：〈我的書架沒有秘密〉，《走出中世紀二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18-320。按，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云：「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 卷，頁 208）第二版跋提到：「以文化本身為對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都更加不能把意識的任何一個形態或任何一個結果作為基礎。這就是說，能夠作為批判的出發點的，不是觀念，而是外部現象。批判不能限於拿一個事實比較對照於觀念，而是要拿一個事實比較對照於另一個事實。」（同前書，頁 216。按，此段文字本為伊·考夫曼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觀點〉中對馬克思辯證方法的描述，馬克思引用後表示描述得「這樣恰當」）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纔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同前書，第 3 卷，頁 574）

<sup>48</sup> 朱維錚：〈陽明學在近代中國〉，頁 252。按，原引《德意志意識形態》文字略有誤，今正。

康有為和章炳麟描繪孔子，命意相反，造假則同。就命意來說，他們雖然互相反對，但都出於要求中國進步的渴望，都不算錯。問題在於，他們都多少自覺地認為，只要使好意得到實現，便可不擇手段，因而歷史也就只被看作達到某種現實目的的手段。然而歷史究竟不是手段，它屬於已經不可改變的過去，屬於任何主觀意向都已對它莫可奈何的客觀存在。人們可以由歷史發現過去與現在的聯繫，卻不能由歷史找到救治時病的現成藥方，否則勢必抹煞歷史與現實的區別，任意剪裁歷史為我所用。康有為和章炳麟，在孔子問題上的毛病，正是同出於此。<sup>49</sup>

對於一切「非歷史」的歷史評價，朱先生均表反對。而無論出於多麼高尚的目的，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終將被手段反噬，使手段成為目的本身，必然會受到歷史的審判。

### 三、章太炎與近代思想學術史

除了章太炎以外，朱維錚先生對晚清的很多重要人物、重要典籍都有研究，包括康有為、劉師培、宋恕、梁啟超、辜鴻銘、馬相伯等，由此，也構成了他在經學史、史學史和文化史之外的另一塊學術研究版圖。而據朱先生自述，他「轉入近代思想史，即自研究章氏著作始」<sup>50</sup>。

朱維錚先生的近代思想史研究，涉及範圍較廣。限於本文的主題，為免枝蔓，這裏只稍微提示兩點。其一，朱先生所謂「近代」，並不始於一八四〇年。雖然到晚年，他纔公開大聲疾呼反對「腰斬」清史，反對「兩炮論」<sup>51</sup>，但自研究近代思想史伊始，朱維錚先生即主張至少要貫穿整個十九世紀，更透徹地說，則應從明末清初開始。其二，朱維錚先生在注釋《章太炎選集》的時候，即已特別注意「西學」對於章太炎的影響，於是，「西學」始終構成他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有機組成部分，更深一層說，他始終將中國置於「世界」之中<sup>52</sup>。

<sup>49</sup> 朱維錚：〈歷史的孔子與孔子的歷史〉，中華孔子研究所編：《孔子研究論文集》（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年）；後收入朱維錚：《走出中世紀》，頁227-228。

<sup>50</sup> 1980年7月6日致汪榮祖函。

<sup>51</sup> 見朱維錚：《重讀近代史》（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

<sup>52</sup> 對此，李天綱教授已有指出，見氏著：〈且復且兮憶吾師〉，《讀書》，2013年第3期，頁71-78。

回到章太炎所在的晚清民初。朱維錚先生還是從最基本的材料入手，從整理重要人物的著作開始。除了章太炎的著作以外，他整理過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整理過康有為的《實理公法全書》、《教學通議》、《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我史》，整理過《馬相伯集》，帶領學生整理「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等等。當然，朱先生從事這些文獻的整理工作，常常是被出版社或友朋「脅迫」的，也有當年基本材料並不像今天那麼易得的因素在，但在此之中，他的選目，他的標、校、注，蘊含著他的慧眼卓識和巨大心力，使這些書成為後來研究者一直使用的、可以信賴的文本<sup>53</sup>。即使有些人物後來出版了文集、全集，但名家的選本，仍然具有學術指引意義。而這樣的整理工作，也往往可以成為學者功力的「試金石」。

在整理文獻過程中，朱維錚先生對其人其書予以縝密的考訂，力求探清其人的生平行跡及其書的撰寫過程，這仍舊可以說是先做「笨功夫」，以弄清「為什麼」作為研究的第一步。相關各文，發前人所未發，見前人所未見，論證嚴密，極見精彩。上文已經提及他對於《嘯書》、《檢論》結集過程的考訂。再比如〈康有為在十九世紀〉一文，從種種矛盾的陳述中還原康有為的早年經歷，揭露出他在自傳《我史》中「倒填年月」、「閃爍其詞」等種種虛飾不實之處，抽絲剝繭，如老吏斷案。〈梁啟超和清學史〉考索梁氏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間的活動軌跡，澄清了《清代學術概論》的寫作背景與緣由，意見也是相當深刻的。

近年來在文史學界引起很多討論的「晚清」與「五四」<sup>54</sup>的相關度問題，大概始於二〇〇五年王德威提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之說。他重審中國現代文學的來龍去脈，強調晚清文學的重要意義<sup>55</sup>。此後，這一論題已超越文學史，在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等各領域引起廣泛爭議。但是，早在此說提出二十多年以前，朱維錚先生就已經指出，胡適把新文化運動稱作「中國的文藝復興」，而在晚清，以章

<sup>53</sup> 如葛兆光教授即認為：「這些編校注，也許是他在當代中國學術史上最重要的貢獻之一。」見氏著：〈那一道不會消逝的風景〉，《懷真集》，頁75。還應當指出，這些典籍後來出現的不少整理本，其實是在朱先生工作的基礎之上進行的。

<sup>54</sup> 此「五四」是就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來說的，並不是單指1919年5月4日的學生運動及隨後以罷課、罷工、罷市為主要形式的政治運動。

<sup>55</sup> 王德威著，宋偉傑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導言〈沒有晚清，何來五四？〉。



太炎為首的一批學者倡導的「文學復古」，模擬的就是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一定程度上來說，是章太炎「引導」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他特別提出三點值得注意：

其一是章太炎早年對孔子和經學傳統所作的否定性批判，應說是「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直接先聲；其二是章太炎早年的一批朋友和學生，以後組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核心，如前者中的陳獨秀、蔡元培，後者中的錢玄同、魯迅、周作人等，甚至可以包括胡適；其三是章太炎早年所支持的一批學者和文學家，如《國粹學報》的黃節、劉師培、馬敘倫等，南社的柳亞子等，曾經從學術和詩歌方面，進行過認真的、雖然並非是成功的「文學復古」的實驗。<sup>56</sup>

當然，究竟如何看待「五四」，「五四」的主題到底是什麼，至今仍有爭議，但朱維錚先生無疑已經點出了晚清與「五四」的直接關聯，表明要想探求「五四」的來源，就非得將晚清及章太炎納入研究視野不可。而在上世紀八〇年代以來的一系列文章中，朱維錚先生更是早已指出晚清的意義。無論是「中國的文藝復興」、「現代化思潮」，還是「民族主義」的興起，晚清都是不容忽視的存在。

從討論晚清的重要性來說，朱維錚先生雖然也多次指出其對後來的「引導」作用，或者說晚清如何「開新」，如何引出「近代」，但他的研究，明顯更側重於在時代變局中的晚清學者如何看待中國歷史，如何看待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古代的歷史與人物又如何影響著晚清人物的頭腦，即晚清如何「走出中世紀」。他重探晚清的「尊荀」與「排荀」思潮，意在討論晚清那批新舊學者，如何判定「神州長夜誰之咎」，即中國中世紀兩千年的黑暗該由誰負責；討論「陽明學在近代中國」的復活，在中西新舊學說不停衝突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揭示王陽明在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孫中山、梁漱溟等人的頭腦中何以始終揮之不去；討論黃宗羲及其《明夷待訪錄》在晚清所引發的爭議，看政見的差異如何影響章太炎、孫中山對待黃宗羲的態度變化。在朱先生看來，晚清那批人，常常要藉助於中國已有的文化傳統，作為自己「論學」更尤其是「論政」的資源，一方面，傳統可以說是一種「工具」，現實的社會政治纔是影響他們如何利用傳統的主導因素，他們是從現實出

<sup>56</sup> 〈失落了的「文藝復興」〉，作於1989年「五四」前夜之香港，原載林毓生等著：《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後收入朱維錚：《音調未定的傳統》，頁135。

發，而不是從所要利用的傳統的「歷史真實」出發，來發表他們的主張，「通經」是為了「致用」；另一方面，他們卻又不得不依賴於固有的傳統，不得不通過重新評價傳統的方式來表達對現實的意見，換句話說，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傳統，是他們無法擺脫與拋棄的「枷鎖」，導致「死人捉住活人」（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語）。

不難看出，對於晚清學者的邏輯取向，朱維錚先生是頗不以為然的。作為歷史上存在過的現象，他以為有必要加以研究，卻並不表示贊同。類似於章太炎晚年提倡讀經，以為經典的抽象原則千古不磨，具體措施則可以因時制宜，朱先生以為這已開「抽象繼承法」的先河，對此，他不客氣地予以批評和否定。這裏面有他對八〇年代以至新世紀以來所謂「新儒學」、「國學」表示不滿，但更多的是他認為，「傳統文化」屬於已經消逝的過去，是死掉的文化，而活著的「文化傳統」，「主流是消極的、沒落的、體現古典文化必須否定的方面」，因而雖然仍在現實中發揮作用，應該實事求是地研究，卻不能作為走向現代的起點<sup>57</sup>。在這一點上，他是五四的信徒，或者說是早年章太炎的學生，而非晚年章太炎的繼承者。

在上述各場論戰之中，章太炎無所不在。或首開風氣，或率先發難，或以其深厚的學養介入，而使人不得不注意其見解。朱維錚先生以章太炎為研究的線索和起點，揭示了晚清一系列重要的學術思潮、思想論爭，凸顯了晚清在中國從漫長的中世紀走向近代的過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反過來，他對於晚清思想學術史的討論，也進一步突出了章太炎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就朱維錚先生的章太炎和晚清思想史研究來說，二者是一體之兩面，是互為背景的。

朱維錚先生對於章太炎和晚清思想史的研究，直接引發、奠定了此後他的研究重心。就其影響最大的著作來說，他「萌發撰寫這部《走出中世紀》的念頭，正始於那些年研究章太炎思想的過程中」<sup>58</sup>。這裏面有兩個層次值得提出。一是章太炎

<sup>57</sup> 朱維錚：〈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後收入朱維錚：《音調未定的傳統》，頁14-26。

<sup>58</sup> 朱維錚：〈關於早年章太炎——章太炎著作按語一束〉附識，《走出中世紀》，頁289。朱先生有關「走出中世紀」的討論，不止限於《走出中世紀》、《走出中世紀二集》二書，同樣包括《音調未定的傳統》、《重讀近代史》等書在內。甚至可以說，這一關懷貫穿於他全部的研究之中。對此，朱先生在《走出中世紀》的增訂本小引中已指出，他編校「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編著的《維新舊夢錄》，以及結集的《音調未定的傳統》、《求索真文明》等，都繼續了

的《嘯書》等著作，出自排滿革命的需要，對滿清二百多年統治中的政治與文化專制、種族壓迫、皇帝的獨裁、讀書人的無恥等予以深刻的揭露，充滿了「對於束縛自由和阻礙進化的現狀的批判」<sup>59</sup>，而這，也同樣構成了朱先生討論「走出中世紀」這一主題的核心。他的單篇短論，以一個個看似細小的切口，解剖了十六世紀末以來中國社會之中無所不在的「古舊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為的遺存，給走出中世紀的過程帶來的種種困擾」。二是章太炎的著作，貫穿著對整個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思考，但他直接面對的是滿清的統治，現實的背景始終縈繞在章太炎腦際。朱維錚先生探究「中國走出中世紀」的過程，雖然時代斷限截止到二十世紀初，但背後有他所處的八〇年代的現實的投射——甚至是五〇年代上大學以後他所親歷的那段歷史的投射<sup>60</sup>。儘管他避免直接對中國是否已經「走出中世紀」這一問題予以清晰的回答，但在研究中，卻不斷提醒讀者，表徵中世紀的黑暗的種種現象是否消失，「有歷史在」。

在「革命家」和「思想家」的另一面，章太炎也是一個「學問家」，更是近代學問最淵博精深的學者之一。剝離「政治」色彩，對於章太炎的「純學術」，朱維錚先生雖不做專門研究，但並不否定其價值，且多次提出要予以重視，尤其是指出對後來相關研究的影響。「他生平留在學術史上的業績，遠非已陳之芻狗。尤其是他晚年的學術傾向和若干見解，在受過那麼多的否定之後，猶如驅不散的幽靈，仍然隱現於某些學術領域，只消略窺孔子和儒學研究的現狀便可瞭然」<sup>61</sup>。甚至是章太炎的一些「論戰」文章、一些早年的「鞫迫」之言，其中的學術見解也是相當深刻的。

在許多地方，朱維錚先生都指出了現代中國學術的很多基本觀點，其說皆始於章太炎。只不過章太炎太難讀，用語太古奧、簡潔，其見解每為人所忽略，反不如梁啟超、胡適等人的傳播「影響」大。比如近代討論清代學術的首出之作，當屬收錄於章太炎《嘯書》重訂本中的〈清儒〉一文，作於一九〇四年之前。〈清儒〉意

---

《走出中世紀》的思路與課題。

<sup>59</sup> 朱維錚：《嘯書》發微》，頁 271。

<sup>60</sup> 該書出版後，朱先生講學海外，一年半回國後翻閱數百通讀者來信，發現其中提出最多的問題，是「中國有沒有『走出中世紀』？」見《走出中世紀》增訂本小引。

<sup>61</sup> 朱維錚：〈關於晚年章太炎〉，《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 年第 5 期；後收入朱維錚：《走出中世紀》，頁 301。

在批判滿清的桎梏使讀書人埋頭於故紙堆，也有針對康有為今文學說的意味，但不能否認其中蘊含著對於清代學術發展脈絡的梳理，對於清代學術成就的總結。但至今天研治清學史的學者，往往以為章太炎的说法，更多出自批判滿清的漢族民族主義立場，以政治關懷來評價清代學術，於是在反滿民族主義失去現實意義以後，其影響便大為削弱，遠不如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胡適《戴東原的哲學》乃至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重要。後來者在現實中的「影響」超過了首創者<sup>62</sup>，這一現象及其原因當然值得探究，但就學術史的演進歷程而言，就後來者接受、吸收、深化或反對、更正首創者的論點而言，〈清儒〉實在是不應該被忽視的名篇。

受周予同先生影響<sup>63</sup>，朱維錚先生一直重視〈清儒〉，對於該文的貢獻，他也早有說明：

本篇是對清朝二百餘年學術變遷史的系統總結。原篇分三節。首節分析「經」的性質，認為同世界文明古國的記錄一樣，是夾雜著神話迷信的古史，硬拿來搞「通經致用」，結果既不通歷史，又危害政治。次節說乾嘉考據學者恢復了把六經當作歷史研究的傳統，所以在學術上放出異彩；但樸質的考證，不合文士的口味，於是有攻擊漢學的桐城派出現，於是又有欣賞《公羊》三世說的常州學派出現，於是又有調和漢、宋學以求名的陳澧等出現。末節是關於清朝經學研究具體成果的評論。最後針對康有為等否定考據學作用的意見，認為考據學家強調無徵不信，竭力搜集證據，到未來的歷史學家應用時，便會看到這種樸實的東西發出光輝。全篇雖對清朝今文學派的批評有失公正，對戴震一派的估價也未免過分，但材料豐富，分析清楚，是

<sup>62</sup> 朱先生以為，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既非同類課題的首出之作，更非具有專門史經典意義的佳作」，但「堪稱一部天才論述，越是離著作情境更遠的讀者，越易將它看作客觀勝於主觀的學術史佳作」，見〈梁啟超和清學史〉，本為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萊閣叢書」中《清代學術概論》導讀，作於1996年冬至1997年春；後收入朱維錚：《走出中世紀二集》，頁90、124。

<sup>63</sup> 周先生在主編《中國歷史文選》時不顧反對，堅決主張收入〈清儒〉一文，並在中國經學史課程中指出其在學術史上的價值，見朱維錚：〈梁啟超和清學史〉，《走出中世紀二集》，頁119；《中國經學史講義》，收入朱維錚先生編校的《周予同經學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581、621。

近代總結清學的首出作品。以後，劉師培著〈清儒得失論〉，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等，都明顯地以它為繼續研究的起點。<sup>64</sup>

章太炎對於清代學術某家某書某派等的獨到之見暫時置之勿論，這裏僅就其學術「指引」意義做些說明。提要指出，〈清儒〉次節勾勒出清代學術的基本演進歷程，即由考據之樸學到桐城派，到公羊學，到調和漢宋，後者都是從對前者的不滿、反對而產生的。這樣一條線索，很難說後來梁啟超的「以復古為解放」沒有受到它的影響，而梁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羅列清代學術的各項成績，其形式更明顯屬於〈清儒〉中第三節評騭清朝經學研究成果的擴大版。還有梁啟超、胡適遵從章太炎之說，認為清代漢學復興始於顧炎武首倡「捨經學無理學」，都強調戴震在清學史上的「轉捩」作用，也是繼承章說而有所發展<sup>65</sup>。還有如清代漢學分吳、皖二派，吳派好博而尊聞，皖派綜形名，任裁斷；如重視章學誠，以為《文史通義》近〈史通〉；如以清學之長在於求是等等，大多已成為後來的通行看法或研究者的「共識」。即使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止不滿於梁著，實際上也針對〈清儒〉中「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的判斷，而要表明「清代乾嘉經學考據之盛，亦理學進展中應有之一目，豈得據是而謂清代乃理學之衰世哉？」<sup>66</sup>無論贊成與否，章太炎對於清代學術的意見，對晚清民國時期的清學史研究是籠罩性的，是相關研究者無法繞過也必須直面的。而章太炎對於清代學術的意見，也不止〈清儒〉這一篇<sup>67</sup>。

因為朱維錚先生對於章太炎的著作讀得熟，對章太炎各方面的見解瞭然於胸，

<sup>64</sup> 周子同主編，朱維錚修訂：《中國歷史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下冊，頁328-329。此處引自〈梁啟超和清學史〉（《走出中世紀二集》，頁120），其中明言「將我舊作的〈清儒〉提要轉錄如次」，說明此文為朱維錚先生所作。

<sup>65</sup> 朱維錚：〈關於清代漢學〉，《走出中世紀二集》，頁280-282。

<sup>66</sup> 錢穆：〈清儒學案序目〉，《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頁544；錢著自序言「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4），朱維錚先生以為此「人」只能指章太炎、梁啟超。至於不出其名，則在於有所避忌：國民黨厭惡梁啟超與孫中山作對，也厭惡章太炎反對孫中山，更於章氏公開抨擊蔣介石不滿，而有懲辦「章逆」之舉。見朱維錚：〈關於錢穆研究〉，《走出中世紀二集》，頁146-147。

<sup>67</sup> 近年來也有一些學者指出，要重視章太炎在清代學術史方面的貢獻和價值，如張昭軍：〈章太炎與清學史〉，《中華文化論壇》，2003年第3期，頁94-100；孟琢：〈清代學術的歷史總結與思想突破——章太炎〈清儒〉的四重解讀〉，《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頁100-108。



所以在看待二十世紀以降的學術史中，能夠清楚地看清相關研究的淵源所自。對於先秦諸子，尤其是儒家的起源，章太炎有一系列文章直接影響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先秦諸子研究，包括〈訂孔〉、〈論諸子學〉和《國故論衡》中的〈原儒〉、〈原經〉等。朱先生以為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對先秦的儒道名墨法各家哲學進行梳理，其結論長期被哲學史明引暗襲，無疑表明他在這個領域確有創見」，「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提供了直接啟示」<sup>68</sup>。胡適的〈說儒〉，更是直接繼承〈原儒〉而作<sup>69</sup>。他評價饒宗頤先生《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在明言「正之義尤重於統」、「歷史之稱是謂之正」這一點上，與梁啟超〈論正統〉、章太炎《國學略說》的見解並無二致<sup>70</sup>。他以為討論「新儒學」，追本溯源，就應該承認它始於清末，應當注意康有為的孔教論和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論；論其走向，也當注意梁漱溟與梁啟超、熊十力與章太炎的「親緣」關係；不能不注意從章太炎到熊十力的轉折<sup>71</sup>。此類見解，有時或許令後來的研究者不快，但出自符合歷史的判斷，又不能不讓人信服。同時也不得不讓人反思，有多少研究是在章太炎的延長線上，又有多少研究並未超出章太炎的觀點。朱先生的反覆提示，值得回味。

這裏還應該指出的是，對於章太炎「學問家」這一面，具體哪些「學問」值得重視，朱維錚先生也是有一定選擇的。像小學、醫學，雖然也承認其價值，並特別表彰章太炎「開創了從時空連續性角度研究語言史的先例」<sup>72</sup>，但總體而言，這些並非他關注的重點。他所注意的，更多的是章太炎在特定時代之下的「學問」追求和研究取向。比如他認為，章太炎早年探求歐美日本流行的社會進化論、人權理論、無政府主義、宗教學等各種學說，在晚年「從考據和義理相結合的角度」對國學即經學的歷史的研究，在學術研究中注意「學說如何受政治干預的影響」、「學派如何因自身的內在矛盾而走向否定」、「學者如何能夠自由發揮思想而開一代風氣」，對研究學術思想史都有啟迪作用。而歸結起來，朱先生以為，章太炎治學，「其實

<sup>68</sup> 朱維錚：〈《國故論衡》校本引言〉，《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後收入朱維錚：《求索真文明》，頁291、292。

<sup>69</sup> 朱維錚：〈難講的「原儒」公案〉，《文匯讀書週報》，2000年11月4日；後收入朱維錚：《走出中世紀二集》，頁131-135。

<sup>70</sup> 朱維錚：〈讀《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作於1996年乙丙之際），《走出中世紀二集》，頁291。

<sup>71</sup> 朱維錚：〈從儒學史說到新儒學〉（作於1998年春季），同前註，頁303。

<sup>72</sup> 朱維錚：〈《國故論衡》校本引言〉，《求索真文明》，頁290。

關注的焦點，在於『國病』。從經史研究考察『國病』的由來和演變，從現狀研究分析『國病』的根源和治術，始終是太炎做學問的出發點和歸宿」<sup>73</sup>。可以看出，在朱維錚先生眼中，章太炎的「學問」本身，也仍然有現實的關懷和指向在，是與他「革命家」、「思想家」的身分「三位一體」的，並不能脫離晚清民國的具體時空而獨立。

從所謂「學脈」上溯，朱維錚先生的兩位老師，周予同先生和陳守實先生，可以分別追溯錢玄同、梁啟超，再到章太炎和康有為，朱先生在學術上對章、梁更為重視，應該受到他兩位老師的影響，但更多的應該是自身的學術認同，使得他常「左」康而「右」章<sup>74</sup>。可以說，章太炎是對朱維錚先生影響最大的前輩學者，甚至可以說是他探究中國歷史的出發點。朱維錚先生對中國經學史、中國學術史、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很多都是建立在章太炎的基礎之上的<sup>75</sup>。在朱先生的大量文字和觀點之中，處處可見章太炎的影子。

本文大概梳理了朱維錚先生在章太炎以及相關的晚清思想學術方面的貢獻。他對於章太炎及晚清學術思想的研究方法與思路、基本論點，已然成為後來繼續研究的前提。隨著近年來章太炎相關研究在海內外越來越成為學術熱點，回頭梳理朱維錚先生的章太炎研究，對於推進學界進一步深化對章太炎的認識，乃至重新討論晚清以上的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史，相信不無啟示作用。

附記：作為朱維錚先生的晚年弟子，不敢說對朱先生一生的思想與學問瞭解到什麼程度，但近年來參與整理先生的著作，選編了他的《壺裏春秋二集》、《章太炎與近代學術》，在反覆研讀、學習先生的著作中，仍然不斷獲得教益，也愈發覺得先生的研究有其不朽的價值——當然，這不表示我對先生的立場、觀點亦步亦趨。

<sup>73</sup> 見朱維錚：〈關於晚年章太炎〉，《走出中世紀》，頁 299-300；〈從三個角度看章太炎〉，《朱維錚學術講演錄》，頁 267-268。

<sup>74</sup> 這裏的「學術」認同，既包括學術研究的理路，也包括個人氣質、精神方面的接契。對此，李天綱教授、鄧志峰教授、馬勇教授均有所揭示，分見〈旦復旦兮憶吾師〉、〈雪月之靜穆與莊嚴〉、〈朱維錚先生對章太炎的解讀〉。

<sup>75</sup> 比如馬勇教授認為朱先生「通過章太炎建立了一個與周予同完全不同的經學史解釋體系」，見馬勇：〈當代中國學術史上的朱維錚〉，《中華讀書報》第 9 版，2012 年 3 月 14 日。

今年是朱先生逝世十週年，按照先生的教誨，昨天的一切都已屬於歷史，他也成為「歷史人物」，自然可以作為研究的「對象」。但由學生來評價老師，總是有背於傳統的師弟之道；何況由於親炙的緣故，也很難做到所謂「客觀」。因此這篇小文，豈敢說是「研究」，只是我進一步向先生學習的一份作業，希望尚屬於可以令先生在天之靈滿意的答卷。

2022年5月於滬上被「封控」之中